

沈从文先生为我写的一封介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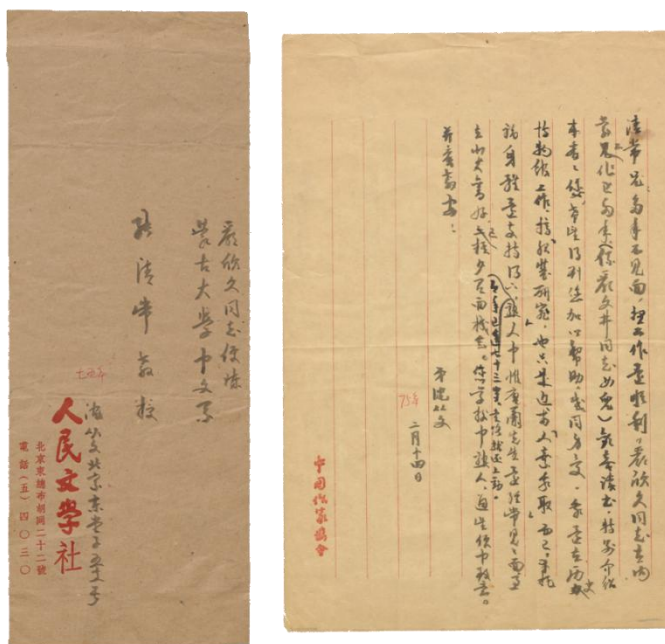
严欣久

清常兄：

多年不见面，想工作还顺利。严欣久同志在内蒙工作已多年（系严文井同志的女儿）欢喜读书，特别介绍来看看您，希望得到您加以帮助，感同身受。我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搞搞“服装研究”，也只是近于“人弃我取”而已。幸托福身体还支持得下。今年已达 73 岁，走路就还上劲。熟人中唯唐兰先生还经常见面。过去山大旧好已极少见面机会。您学校中熟人，通望便中致意。并候教安！

弟 沈从文

二月十四日（1975）



沈从文致张清常的信及信封

这封信写于 1975 年 2 月 14 日，既是沈从文先生写给老朋友张清常教授的信，又是我牵线去见张教授的介绍信。

1975 年，“文革”还没有结束。1971 年“9.13”事件爆发后，干部政策有了松动，北京到“五七干校”的干部陆续回京，重新被安排工作。沈从文先生因身体不好，1972 年回到北京看病，然后继续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

父亲严文井、母亲李叔华于 1973 年内，先后回到北京。这时中国作协还没有恢复，父亲就在他原先兼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留了下来。母亲身体不好，由华北局调到离家很近的版本图书馆工作。1974 年 10 月，母亲突然子宫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被检查出癌症。经过

手术与化疗，于1975年2月8日出院。

我和爱人刘鲁都是1968年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1971年上半年，同时被选调到内蒙古邮电管理局微波大队。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我立刻从呼和浩特赶回北京。而刘鲁一直被单位派在外省学习，直到1974年底才结束。那时我们还没结婚。为了让母亲能安心地离去，我和刘鲁于1975年1月领了结婚证，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就算举办了婚礼。

母亲经治疗病情尚稳定。在她出院的前一天，我和刘鲁回到东总布胡同我父亲的家，商量母亲出院后的安排。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正说着话，沈从文先生来看望父亲。他那时住在东堂子胡同，离我家有不到十分钟的距离。沈从文先生大我父亲13岁，是父亲从事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两人相识是1935年底的事。那时父亲是个文学青年，到北平后，正闯文坛。沈从文先生则已名声大震，编辑着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每个月会约请文学青年在公园喝茶，谈天，约稿。抗战时期，父亲在延安鲁艺任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割断了音讯。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东北日报》任副总编分管副刊，沈从文先生编辑天津《益世报》副刊，父亲的文章偶尔会在《益世报》上刊出。解放后，父亲与沈从文先生于1951年年底重逢。1954年-1956年，父亲在《人民文学》杂志先后任副主编主编，母亲李叔华于1956-1964年也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曾担任过编辑部副主任及党支部书记。沈从文先生夫人张兆和大约也是在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工作，一直到退休。在两家没有搬家前，一直有所往来。母亲生病后，也一直得到大家的关心。

那天，沈先生来后，先是问候了母亲的病情，然后与父亲聊起天。现在还能记得的有，沈先生说自己有血压高，正在吃别人介绍的偏方“蚕蛹”。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问，蚕蛹的味道一定很怪吧。沈先生说，不怪，很好吃，炸一下像花生米一样，而且是高蛋白。沈先生说话声音不高，但很有底气，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两眼中有一束光。虽说是古稀高龄了，腰背还是直的，显得还健朗。

爱人刘鲁对沈从文先生很是敬仰，于是在与沈先生告别时，我们约了时间去他家看望。2月14日晚，我和刘鲁到东堂子胡同51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由于“文革”抄家，沈先生原有的两间小屋仅留下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夫人张兆和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的另一间小屋，过着同地分居的生活。沈先生住的这间小屋逼仄而拥挤，除了书桌、床，就是满满的资料和稿件。屋里还要挤一只取暖的炉子。他坐在书桌前，我和爱人则挤坐在他的睡床上。对我们的造访，他很高兴。欣然讲起了他还没有完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拿过书稿给我们讲解图上的服饰、人物造型。他可以根据服饰来断代，让我们感到很神奇，充满敬佩。每讲

完一段话，他都会用“很好玩”来结尾。我们不禁感叹他的工作环境太简陋，知道他每天都要在陋室里工作到很晚，就劝他要多注意身体。他也不禁黯然神伤，说，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这样写着写着，趴在桌子上走了，没有人知道。说到这里。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们赶紧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您看上去很健康。老天会保佑您的！

过去，我仅知道沈从文先生是个大作家，但因那时社会不宣传他，我的兴趣又仅限于读外国小说，所以没读过他的作品。这会儿我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有趣、满腹学问的人。于是向他提了个请求，希望在内蒙也能找到一位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可登门向他请教。沈先生想了想说，我在内蒙有一个朋友，但好久没联系了。他是内蒙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清常教授，对韵律、音乐、文学三者的关系很有研究，精通音韵学。他是 1957 年去的内蒙古大学，现在也不知道他怎样了，还在不在那里。你们去了正好可以帮我看望他。说完他提笔写了这封信，又郑重地在信封上写了“严欣久同志面陈”。

母亲出院后病情暂时稳定，我因已请了四个月的假，就和刘鲁于二月底回了内蒙。回到内蒙后，我忙于安置自己的小家，并牵挂着母亲的病情，未能马上去找张清常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呼市的交通非常不便，公交车极少，又没有固定钟点。人们出行主要靠自行车，而自行车又要有票证才能购买。且我家离内蒙古大学不近，又没交通工具，去拜访张清常教授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五月份，单位派我去河南南阳实习一年，我跟单位打了招呼，家里一旦需要，我还得回北京照料母亲。果然到了十月份，母亲因癌症扩散，重新入院。父亲支持我工作，说不到不得已，不叫我回家。1976 年 2 月，我收到家里的电报，叫我速回。我知道母亲的生命已临近终点了。回到北京，我天天陪伴着母亲，尽管已她瘦得不成样子，但生命力很顽强，直到 5 月 14 日，才停止了呼吸。

母亲的追悼会于 5 月 21 日在八宝山举行，文艺界的许多人士都去了，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也在其中。那天，沈从文先生特意问我，去见了张清常先生没有。我告诉他未能去的原因。沈先生略沉吟了一下说，听有的朋友说，张清常已于 1973 年离开内蒙了，我还担心你跑了冤枉路……

尽管未能去拜访张清常教授，但沈先生写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物件越是珍藏得好，越容易找不到。这封信我收藏好后，竟一直再也没见到过。直到 2018 年 9 月，国图要召开原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与国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览，让家属配合找资料，刘鲁在翻箱倒柜时，才找到了这封信。

重读这封信，感到有必要把沈先生信中提及的人物及地方，做个简介。

张清常教授：（1915-1998）语言学家、教授。贵州安顺人。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

究院中文系。1949年前，曾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开、内蒙古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授，并兼职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借调到内蒙古大学，一去16年。1973年，南开大学用“课题带教学”的方式，把他从内蒙借调回来。1981年调入北京语言学院任教授，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清常教授早年致力于语言、音乐、文学三者关系的研究。他谱写的《西南联大校歌》曾广为流传，以后他长期从事汉语语音词汇的研究，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胡同及其他》《北京街道巷名史话》《战国策笺注》等。

信中提到的唐兰先生（1901-1979），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终身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论著甚丰。1921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建国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中文系代理主任，并应故宫博物院之聘，兼任设计员。曾任故宫博物院美术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等职。著有《中国文字学》《殷墟文字学》《古文字学导论》等。

抗战时期，沈、唐、张三位先生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1950年代，唐兰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与沈从文先生工作单位历史博物馆属同一个系统，工作有交集。“文革”中又同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文革”时期沈先生能与唐兰先生经常见面，应是情谊深厚。“山大”即山东大学。民国时期，前身是青岛大学，1932年9月改名山东大学，沈从文先生在这里任教了两年。

信中说的“服装研究”，指的是当时沈从文先生正在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这封信今日重读，感慨万千。当年，我若找到了张清常教授，这封信就不会在我这里保存43年了。但没能找到张清常先生，使我失去了与这位学者交往的机会，则是很大的遗憾。1988年9月，我从内蒙调回了北京。而沈从文先生已早几个月前去世，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这封信，又把我带回四十多年前，那个温馨的晚上。年轻时不曾读懂的东西，现在懂了。

严欣久 2018年9月16日

说明：2018年8月，严欣久女士将此信无偿捐赠国家图书馆。此封书信的辨识得到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薛龙春教授的大力帮助，在此致谢。（古籍馆 孙俊）